

「支那認識」與臺灣日本語系文學：以呂赫若《清秋》為例

吳嘉泓*

摘要

從日治時期文學探討華語語系與日語語系在臺灣發生的複雜關係，有助於我們解決華語語系討論中的二元對立框架：在地化或重視中國根源。過去史書美與王德威對於華語語系／華夷風（**Sinophone**／**Xenophone**）的爭論，聚焦於如何擺置實體中國、與臺灣文學之兩者關係，但本文則將近代日本帝國放入互動的角色，複雜化此一歷史情境。有鑑於近代日本知識分子生產出一套強調對象化、科學化中國的再現論述，本文嘗試以「支那認識」的概念，重新省視此一情境下臺灣漢人作家的日本語文學運動。面對中日戰爭情境，臺灣漢人日語作家視此為突顯臺灣之漢文化特色的機會。在呂赫若（1914-1950）此一個案中，對中國古典傳統的重新認識成為其重要的寫作資源，甚至具有使命感，然而其認識顯然也獲益於來自日本的「支那認識」。呂赫若於《清秋》（1943）完成諸多描繪臺灣漢人家族的文學成果，也因而不能被簡單地理解為在地文化的發揚或是漢文化的保存，而應同時重視「支那認識」等知識中介於其間發揮的作用。

關鍵詞：華語語系、日語語系、支那學、支那認識、呂赫若

2022.09.29收稿，2022.10.21通過刊登，2022.11.10修訂稿收件。

*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SHINA knowledge” and Taiwan Japanophone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in Wartime

Wu, Chia-Hung*

Abstract

Explor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nophone and the Japanophone in Taiwan is helpful in exploring the dichotomous framework used in the discussion of Sinophone Studies : localization or Sinocentrism. In the past, Shih Shu-mei and Wang Der-wei's discussion on the Sinophone/Xenophone studies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literature, yet this article sees Empire of Japan as an interactive role to further complicate this historical context.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modern Japanese intellectuals produced a set of discourses that emphasized objectification and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Japanophone literature movement of Taiwanese Han writers in this context using the concept of “SHINA knowledge” (支那認識). For example, the re-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lassical traditions was an important writing resource for Lu He-Ruo. In his work *Ching Chiou* (1943), Lu He-Ruo depicted many Han families in Taiwan. His understanding however was influenced by “SHINA knowledg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se literary depictions cannot be simply understood as the promotion of local culture or the preservation of Han culture, but they key to unveil the role that “SHINA knowledge” played in Taiwan literature.

Keywords: Sinophone, Japanophone, Sinology, SHINA knowledge, Lu He-Ruo

* Ph. D. Candidates,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一、前言

去年是在事變發生之下渡過，但是在臺灣的文學運動也有令人刮目相待的成績。……可以看到作品本身有相當的進步。只是覺得題材或內容的捕捉方法，比數年前較退步了。也許是由於事變的影響，心情感到迷惘的關係也說不定。不過把這種情形看成是祈求進步的掙扎來說，也是值得期待的。還有，最近令人特別注目的是中國文學的研究。像東朝出現了村松梢風的水滸傳，臺日出現了吉川英治的三國誌。本誌既有黃得時氏的水滸傳在連載。所以能夠想像今後必有臺灣的傳說或故事，被挖掘出來。……臺灣一定存在著和內地不同、十分獨特的東西。¹（粗體為筆者所加）

引自張文環〈獨特之物的存在，今年就放開手做吧〉

1937年發生的盧溝橋事變／「支那」事變，² 開啟了漫長中日戰爭的序幕，而在過往的臺灣文化與文學之歷史敘述中，往往將其視為本地文化遭到強烈威脅的變局轉捩點。例如「皇民化運動」之啟動，臺灣各大報紙的漢文欄廢止，以及「臺灣作家不是被迫沉默……就是在作品中力求抵抗」、³ 「作家不能發聲的年代」⁴ 等說法，都強調日本與中國戰事對於文化層面的巨大破壞，但為何當兩年半後的元旦，臺灣人作家張文環（1909-1978）回顧此期間的心得，卻是期待接下來中國研究、臺灣題材在文學運動中的興盛呢？這不禁讓我們從在近代中日互動的脈絡中，與臺灣此一地理空間的情境下，思考張文環所謂的「文學運動」的意義為何。

17世紀以來的臺灣，漢人始終掌握政治與文化的主導性，但1895年開始的日治時代，則發生巨大的語言文化之改造運動。殖民政府成功推動普及

¹ 張文環，《張文環日本語作品及草稿全編》（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光碟資料disc2。初出為《臺灣新民報》1940年1月1日，版次不詳，原文日文，筆者自譯。以下凡日治時代作者之作品，如非特別說明，皆為日文資料，並由筆者自譯。

² 此為日治時代臺灣對盧溝橋事變的普遍性稱呼方式，在此為理解時代之情境故以括號處理後使用之，並未帶有貶抑意圖，以下同。

³ 葉石濤著，中島利郎、澤井律之日譯註解，彭萱漢譯，《臺灣文學史綱：日譯註解版》（高雄：春暉，2010），頁105。

⁴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上）》（臺北：聯經，2011），頁158。

性的日語教育，近代文學場域之形成，也以日語為尊，而出現臺灣的漢人日語作家群體。直到二次戰後，在中國國民政府的接收下，漢人的日語文學場域裂解，轉而迎接中國的白話文運動。此一之歷史進程，得以收納於「臺灣文學」框架，並受學院認可，受惠於諸多先人前仆後繼之努力。然而審視「臺灣文學」此一框架範疇，仍可理解為是臺灣於1895年從中華帝國統治分離之歷史後果，此即若林正丈所言，由於日本帝國51年殖民統治而產生的戰後兩種民族主義問題，⁵ 而臺灣文學此一獨立於漢語／華文文學之框架的意識生成，也有待於戰後本土化運動之發生。正如前述引文，日治時漢人日語作家張文環將日本內地文壇的作者村松梢風與吉川英治的活動，也援引入對於臺灣的文學運動之舉例，顯見看待日治時期「臺灣文學」之概念時，必須理解其論述前提與情境為何，不能理所當然以今日的「臺灣文學」套用。本文意圖從中國觀等面向對臺灣人日語文學此一現象進行討論，以豐富理解的可能性，而華語語系（Sinophone）的概念正可作為另一思考的開端。

史書美所提出的華語語系研究視角，是參考法語語系（francophone）的後殖民概念，將在中國本土以外、在世界各地以華文寫作，甚至因內部殖民而被迫使用華語的作家放入「華語語系」的範疇。同時呼籲改以「流」（route），而非「源」（root）的觀看方式，⁶ 強調與其迷戀中國彷彿不證自明的霸權根源，更應注意到「華語」於各地方在地化而變異的路徑。華語語系作家展現了「對居住地的承擔」並「在歷史情境內實踐自己」。⁷ 然當時漢語知識階層被迫轉換學習的日語，顯然是另一定居者殖民的強制結果。王德威對於史書美論述的批判性回應，指出「華夷變態」、「華夷混同」本為中國甚至東亞歷史上循環反覆之現象，反對華語語系理論對中國性的擱置，提出以華夷風（Xenophone）改寫Sinophone。此則更有助於我們思考華語語系並非孤立分布於全球各地方所存在，而是與地方與中心、地方與地方間具有複雜的互動關係。王德威認為，「華夷」問題的相對性，有助於理解全球華人社群的相互關係，若過度強調華語語系與中國性的二元

⁵ 若林正丈著，臺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臺北：播種者，2007），頁382。

⁶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臺北：聯經，2017），頁49。

⁷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頁25。

對立，反而失去藉域外的華文書寫反抗中心霸權的可能性。⁸ 無獨有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也提醒，不能過度強調「地方」（place）各自的殊異與變化，卻忽略跨「地方」（place）的文化互動，甚至強調應警覺「空間」（space）對地方強加同一性或共性（unities or commonalities）等跨地域整合的問題意識。⁹ 王德威的論述有過度強調中國性的問題點，但如果我們實際溯近「華夷」問題的歷史現場，亦即近世以來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變化，則更可以將戰爭期臺灣日語作家如張文環、呂赫若的「中國」文化再現，放置在日本的「華夷變態」文化政治脈絡中，思考臺灣作家在面對風俗習慣、家族倫理等具有「中國性」的題材或議題時，其殖民母國日本，正處於欲取代中國的東亞霸權位置的關鍵時刻，而華語語系與日語語系（Japanophone）正在此一激烈變動的歷史時刻擠壓碰撞，各自欲加強同一性或共性之影響力。

臺灣的日治文學運動現象，因日語沿用漢字元素作為部分書寫表記符號，其與華語語系之間的關係，顯然較一般的語言互動更為複雜錯綜。更饒富趣味的事實是，華語語系與日語語系在歷史上長期的彼此糾纏關係，讓51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並非僅僅是後者對前者的取代或壓制，毋寧說，前者依然持續展現影響力。為了釐清日本定居者殖民之歷史與漢字／華語語系之間產生的競逐關係，本文提出「支那認識」此一概念，嘗試作為描述此糾葛關係的一個面向，並以呂赫若這位活躍於日治後期的漢人日本語作家之文學活動作為例證。

過去研究強調中日戰爭期的臺灣人日語文學與皇民化運動及其轉折的密切關係，¹⁰ 包括《民俗臺灣》雜誌對民俗書寫的影響。¹¹ 張文薰則另闢蹊徑，指出此轉變可能無法僅用皇民化運動引起的競合反應來理解，而應該

⁸ 王德威，〈華夷之變：華語語系研究的新視界〉，《中國現代文學》34期（2018），頁18。

⁹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著，吳錦華、陳萃譯，〈文學身份／文化身份：在當代世界中當一個中國人〉，《臺灣學誌》9期（2014），頁172。

¹⁰ 吳密察等，《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臺北：新自然主義：2009）。

¹¹ 朱惠足，《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臺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臺北：麥田，2009），頁230-271。

看到臺北帝大的學院勢力也對文學場域產生重要影響。¹² 本文則進一步探討「支那學」的知識生產，可能也影響了臺灣漢人作家的寫作框架。本文認為呂赫若並非僅是在作品中保存了一種本質的、自然的原生在地臺灣文化，而更將關注點放置於其如何以知識框架為資源，再現自身所經驗的臺灣地方社會。呂赫若藉此產生的作品同時展現了原創性、以及可為當時或現今的殖民／後殖民情境下讀者所共感的可感性。而這正也是理解臺灣如何進入「華語語系」等系統性論述時所不可或缺的視角之一。

二、以「支那認識」為方法

今日身處東亞，若有人使用「支那」一詞，可以想見將引發巨大的情緒反應。特別是對於中華民族主義者來說，這個詞彙召喚了近一個世紀以前日本侵略中國的殘酷記憶，而對有意攻擊今日中國的人來說，這個詞又最能夠展現對中國人民的羞辱。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¹³ 中國的輿論及政府都快速地辨認日文中慣常使用的「支那」為侮辱性的詞彙。¹⁴ 然而，當我們閱讀日治時期的文獻，則會驚訝於臺灣的知識分子仍頻繁而自然地使用「支那」一詞，如本文所討論的作家呂赫若（1914-1951）即是一例，顯然臺灣與中國所處的語境不僅只有時差的距離。事實上，近代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自我主體塑造的需求下，廣泛將清朝或中國稱呼為「支那」，以此對應於英文的「China」；在回應來自西洋視線的同時，將自我宣稱為不同於「支那」的日本，藉此將原本應為「和漢」文化中的「漢」定位為有別於「和」文化的「他者」。¹⁵ 子安宣邦更認為這種透過將中國以「支那」命名的他者化衝

¹² 張文薰，〈一九四〇年代臺灣日語小說之成立與臺北帝國大學〉，《臺灣文學學報》19期（2011），頁99-132。

¹³ 「支那」在19世紀末，甚至中國的五四運動以前，作為客觀看待清朝、中華文明的工具，也未必完全具有負面的意涵，例如在清末的革命家梁啟超、宋教仁都曾頻繁使用，但在五四運動後快速改變。吉澤誠一郎，《愛國主義の創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みる》（東京：岩波書店，2003），頁18。

¹⁴ 有趣的是，在汪精衛建立南京政權後，日本政府大政翼贊會亦呼籲停止使用「支那」一詞，改用「中國」，然臺灣民間顯然仍習慣兩者並用，並未真正統一。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¹⁵ 齋藤希史著，盛浩偉譯，《「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新北：群學，2020），頁49。

動，導致了對中國的蔑視，並導向戰爭。¹⁶ 但日本帝國在19世紀末以來持續併吞清帝國的領土或藩屬，也讓「支那」一詞發揮的排除作用更顯複雜，因為臺灣、朝鮮這些成為日本新領土的地區，過去都與漢文化有著密切關係，「漢」自然是難以輕易排除的要素之一。基於此，與其說日本帝國在東亞的擴展進程是逐步排除「中國」的計畫，與此相反的，許多針對「支那」的描述、討論、研究不斷被生產出來，朝向的是理解、支配，而非排除。日本對中國的領導與支配關係，就建立在這套看似擁有科學理性基礎的「支那」論述之上。本文使用「支那認識」此一概念，描述近代日本對中國的認識，實已透過種種鑲嵌於日中關係演變中的調查、研究、論述，形成了一種與實體中國有別，但有利於日本將之置於被支配地位的特殊認識方式。臺灣的漢人作家在使用「支那」一詞時，如何承繼或批判地看待「支那認識」，則是本篇論文欲在前行研究的基礎上，¹⁷ 進一步討論之重點。

本文認為，殖民時期的臺灣透過國民教育、公共輿論等意識形態的言論生產，已經對包括臺灣人作家在內的知識分子接受「支那認識」產生一定影響。像呂赫若這樣的漢人日語作家群體，雖然嫻熟日語，並積極參與日本語文學之場域，但他們與所謂華語語系之包含的文化傳統與產品並非完全斷裂。許多臺灣人日語作家積極地接觸來自中國的現代嚴肅文藝或通俗小說、電影、古典作品等，然而這並非是單純的由渴望復歸「祖國」之民族主義所驅動，相反的，很有可能正因為他們身處日本帝國的邊緣地位，甚至接近準日本帝國國民的主體位置，為了彰顯自身在「日語語系」的脈絡之特殊重要

¹⁶ 子安宣邦著，趙京華譯，《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頁77-88。

¹⁷ 近來，也有些研究探索日治時期漢人知識分子對中國的態度，注意到日本的支那觀、支那學對臺灣漢人知識分子可能的重要影響。例如羅詩雲指出《臺灣日日新報》呈現出日本所積極建構的中國觀、「支那」觀，反映了競逐世界強權的焦慮，但未詳論如何對臺灣人知識分子產生影響。曾巧雲認為，日俄戰爭與辛亥革命引發了殖民政府在臺灣積極製造「支那」相關的論述，用意在於貶抑中國，而1920年代以前的臺灣漢文人也藉此學習用現代文明的視角，視「支那」為劣於日本甚至臺灣的落後國度。然而這些研究並未將之放置在中國、日本、臺灣三者關係的脈絡進一步研究，本文嘗試以華語語系、日語語系的理論為此議題找到進一步深化討論之方向。羅詩雲，《臺灣日治時期知識分子的中國敘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2016）；曾巧雲，〈故國之內·國境之外——日治前期《臺灣日日新報》上傳統文人的西渡經驗初探〉，《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8期（2014），頁153-206。

性，而產生了對於「支那認識」的敏銳反應。

筆者所使用「日語語系」的概念，誠然是參考「華語語系」而命名。過去對日本帝國學習歐美殖民主義而擴張，而人員移動至臺灣、朝鮮或其他「外地」形成的日本語文學活動之研究，在臺灣多以統治時期來思考，在日本學界則多以殖民地文學的範疇思考。例如臺灣學界從1970年代發掘的「日據作家」，或1990年代後強調的「日治時期」文學，無不以殖民政權的統治時間來界定，關注臺灣居民對殖民政府或帝國的反抗或協力問題。日本學界則多以「舊殖民地文學」，甚或更強調「臺灣文學」的範疇框架，大多數也回應了臺灣在1970年代以後對反殖民或後殖民問題的重視。此皆有強調日本殖民之單向性的傾向（不論是負面或正面評價），而較忽略華語語系與之產生互動的可能討論。近來有部分論者使用外地日本語文學、Japanophone等詞彙，與華語語系同樣強調其變異、多元與非正統。¹⁸ 筆者在此使用「日語語系」，除藉此突顯其背後的定居者殖民性質，另一方面，則更想強調日本帝國近代在東亞進行擴張的過程，其實與中華帝國在17世紀以前的擴張具有可比性。

日本雖然在近世以前曾與中國維持斷續的朝貢關係，但在江戶幕府時代至明治維新後，其實一直關注滿族入主中原的「華夷變態」，並且懷有身為「小中華」的意識、學習中華帝國，嘗試將琉球逐步納為藩屬。「小中華」的意識在目睹中國於近代的內憂外患，幾乎無法自保的危機下，與學習西方殖民主義的知識方法相結合，形成特殊的帝國主義意識。¹⁹ 日本的帝國主義發展不管是南進、北進，都可視為是取代中國在東亞霸權的軌跡，這正可說是基於學習中華帝國經驗後的反客為主。以「日語語系」和「華語語系」結合思考，有助於我們從語言、文字、思想等角度，思考此一日本於近代嘗試取代中華帝國，自己成為有如「中華」一般的東亞霸主之歷史現象。但此「取代」過程並非僅是覆蓋，而有借用、借道的成分；中華的思想文化在過

¹⁸ 西成彥，《外地巡禮：越境的日語文學論》（臺北：允晨文化，2022）、Nayoung Aimee KWON，〈Post/colonial Japanophone versus Global Japanophone〉，《跨境：日本語文學研究》8期（2019），頁8-14。

¹⁹ 岡本隆司著，陳心慧譯，《中國為何反日？：中日對立五百年的深層結構》（新北：八旗，2017）；信夫清三郎著，周啓乾譯，《日本近代政治史（一）》（臺北：桂冠，1990），頁59。

程中成為一種或策略或符號的類工具性存在，使得日本得以以「帝國」的方式思考自身與東亞的關係。此複雜的互動過程與張力的運作圖象，也影響了身處東亞中，個人的主體性建構情境。落實在臺灣空間，則令我們不只關注日本殖民所造成的文化改造，而進一步思考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建構，實發生了「日語語系」與「華語語系」相遇，並且產生競爭及交互影響的現象。

本文接下來將介紹日本形成的「支那認識」之基本性質，並且分析呂赫若在日記中記錄的支那學讀物內容及脈絡，而可能承襲了哪些「支那認識」的中國理解，並且將之應用於對臺灣漢人家族的描寫。必須特別指出的是，張文環、呂赫若等日治漢人日語作家的日治時期論述或小說，現行的中文譯本皆有將「支那」譯為「中國」的傾向，造成語境的偏移或簡化，本文將盡量使用作者的日文原文，以還原語境脈絡。透過以下討論，本文將指出，雖然中日戰爭下，臺灣漢人作家書寫漢人家族題材是當時普遍的現象，但這不僅是戰爭下臺灣民俗調查熱的結果。其中，呂赫若對於鄉村地主、孝道、漢人知識分子等母題的諷刺性描繪，具有討論家族倫理與地方社會複雜關係的深度表現，這正是臺灣作家嘗試在文學技巧上批判性地援引「支那認識」的結晶。

三、近代日本「支那認識」之形成

因為1895年開始的日本統治，日語語系與華語語系在臺灣相遇並彼此競爭。在近代東亞，由於日本積極引進西方現代性，許多現代觀念例如：民主、社會、文學等等關鍵詞，皆有經日本知識分子翻譯後，再為中國所接受的過程；且為了呈現這些概念的重要性，日本的知識分子積極在漢文典籍中尋找能與之對接的詞彙，甚或自造新詞，賦予其新的意義。²⁰ 這一事實突顯了在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仍將中華文明視為重要、珍貴的文化資源。此即近代華語語系與日語語系糾葛之現象。然而為什麼日語在近代較少使用「中國」此一詞彙，而更積極使用「支那」此一取自佛典、屬於舊詞新創的詞彙？正確來說，「中國」的概念確立始於清朝末年，溯源該語詞，其本非國家的概念，而更接近基於方位概念的指稱或自稱，但在西方傳教士的報刊中

²⁰ 任達 (Douglas R. Reynolds) 著，李仲賢譯，《新改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125。

成為一指稱「國家」的詞彙，²¹ 後來更在梁啟超等民族主義者積極推動下，成為清末廣大漢人群體的自我國家想像。「中國」此一概念充滿著讓漢民族重返大國榮光的欲望，而「支那」一詞的使用卻帶有否定這種傲慢的企圖，這可以說代表了近代日本反抗舊華夷秩序之心態。有趣的是，1930年中國政府正式宣布不再接受「支那」此一稱呼，但日本輿論仍堅持繼續使用「支那」，試圖以「國際通稱」等外在規範來否定「中國」的自我命名，²² 正展現了從外部干涉中國主體建構的欲望。

那麼，支那認識的實體內容為何？野村浩一對近現代的中國革命和日中關係有深入研究，使我們有思考此問題的出發點。日本自甲午戰爭、日英同盟、日俄戰爭到日韓併合以來，逐步確立了做為近代主權國家在遠東地區外交舞臺之地位，日本知識分子對自我的認識也放置在階序的格局之中向上爬升；但對中國的認識，也從煩惱如何應對的古老帝國，轉換為「大陸資源」的經略對象。野村浩一討論了學識養成期自明治晚期至大正時期的知識分子的中國認識，指出其共同點，往往將中國視為停滯的、分裂的、難以自主形成現代國家的傳統社會，這種認識橫跨並總結了封建帝國的清朝以及辛亥革命後軍閥割據的中國狀態，也積極或消極地為日本的侵略找到了藉口。²³

野村浩一認為，京都大學的重要支那學學者內藤湖南，在對於中國歷史進行現代科學式的深入研究，並極為讚譽中國深厚文化的同時，卻過度強調中國以地方鄉黨、宗族為主的社會型態，甚至認為這些地方自治勢力會壓過對國家的獨立心、愛國心，這些代表其勢力的父老們只要「鄉里之安定，宗族之繁榮，自我之快樂，此等事若能被保證，則無論何國人之統治之下，均能柔順服從」，²⁴ 並且認為父老的保守性正是中國的革命黨敗給袁世凱的原因。基於此，內藤湖南對於中國在1919年後為抵抗日本侵略而發展的民族主義不屑一顧，甚至對「支那」發展出一套倒錯的保護邏輯：

如果極其簡單地問，要打破支那傳統之政治組織，引導新民眾之政

²¹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頁30。

²²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頁125。

²³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の中國認識 アジアへの航跡》（東京：研文出版，1981）。

²⁴ 內藤虎次郎，《內藤湖南全集 第五卷》（東京：筑摩書房，1976），頁297。

治，其原動力何在？在於日本國民於支那經濟界之活動也。……以此大使命而言，日本對支那之侵略主義、軍國主義一類之議論，完全成不了問題。²⁵

其於政治經濟之領域，國家雖瀕於滅亡，然其鬱鬱乎文化之功業則足以令人尊敬。與此大功業相比，國家之滅亡實無足輕重，毋寧其文化恰能大放光輝於世界，支那民族之名譽，定與天地共存，傳之無窮。²⁶

野村浩一分析內藤湖南的言論邏輯，反映了一方面想將日本的入侵正名，同時身為支那學者，又無法忍受輿論貶低支那文化的複雜心理結構。²⁷ 無法客觀察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正正引發強烈的民族主義此一事實，不僅是內藤湖南這位識見卓著的支那學者之侷限，也是同時代許多日本知識分子的盲點。

野村傾向於強調支那學者對於中國的認識矛盾誤差，蘊含了中日關係走向不平等之動力。臺灣學者邵軒磊則從觀念史的角度考察，指出內藤湖南其實已經是東洋學中非常強調要重視中國文化、和中國友善相處的學者；他所代表的京都學派，是屬於日本近代受西方知識體系影響而建構的「東洋學」其中一支。然而，在東洋學演化系譜中，中國的價值被抽離而成為對象物，籠罩在近代主權國家的現實主義邏輯之下。作為觀念的「中國」，也隨東洋學的變化，在建立日本民族時逐漸成為「他者」。²⁸ 如果暫且放下前行研究各種對於東洋學是否淪為軍國主義工具的爭論，邵軒磊認為，東洋學至少產生了兩種認識中國方式的斷裂或改變：一是在時間上，從通史的角度對中國加以理解，藉以作為日本發展的「對照物」來理解，但也不免帶有社會進化論的色彩；同時，也把西方發展作為另一層次之對照物。二則是在空

²⁵ 引自內藤湖南1924年《新支那論》〈自敘〉。內藤虎次郎，《內藤湖南全集 第五卷》，頁513。

²⁶ 內藤湖南，〈山東問題と排日論の根柢〉（1919），轉引自野村浩一，《近代日本の中國認識 アジアへの航跡》（東京：研文出版，1981），頁64。

²⁷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の中國認識 アジアへの航跡》，頁65。

²⁸ 邵軒磊，〈戰前東洋史學之觀念與知識系譜〉，《東亞觀念史集刊》3期（2012），頁354。

間上，不再相信中國傳統思想的泛用性與放諸四海皆準，而將中國當作「對象物」，強調應通過實證主義的調查來認識中國，同時也將日本放置在與中國相對的關係，討論在現實政治中，以日本為首來主導東洋局勢之趨勢與可能。²⁹ 如果引入前述王德威強調中國性本身就存在「華夷變態」的動態性變化來思考，內藤湖南代表的「支那認識」也蘊含了由日本來主導中國文化再復興的自傲與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以五四運動為轉捩點，內藤逐漸對辛亥革命後的軍閥割據失望，並且急切地提出日本應該更積極協助中國的國家統一，但的確走向更加貶抑中國、正當化侵略主義的方向。³⁰ 這與「支那」被廣泛視為歧視性用語的時間點也大略相符。在中日戰爭爆發後的1938年，創元社結合1914年〈支那論〉、1923年〈新支那論〉，推出新版《支那論》，僅3年時間就達到至少18刷，顯示其廣受歡迎的程度。³¹ 此版本由內藤湖南的兩子乾吉、戊申編輯整理，他們在序中也強調：「著者又強調老大國支那應該藉由日本國民年輕的力量才能重新復活，這正是在東亞的歷史性所必然。這已經成為我們對於現在與將來最為切實的問題了。」³² 可見其所形塑的「支那認識」在中日戰爭爆發後，毋寧是更加發揮影響力。可以說五四運動引發了日本、中國知識分子的強烈對立，原本較中性的「支那學」研究，也開始與侵略主義產生親和性，甚至延續到戰爭時期，為戰爭時以皇國為中心的大東亞主義提供了一定基礎。

概略性地來說，可以認為內藤湖南在五四運動後的「支那」觀非常經典地代表了戰前日本知識分子的「支那認識」。即認為「支那」過於陷溺於家

²⁹ 邵軒磊，〈戰前東洋史學之觀念與知識系譜〉，頁356。

³⁰ 誠然內藤湖南一生的思想是具有相當複雜度的，傅佛果（2013）的研究嘗試從更為整體性的視角，指出內藤湖南與中國思想家如黃宗義等人的聯繫，與他思想的複雜度，以超越內藤湖南僅是一帝國主義者之刻板評價。但正如傅佛果所承認，內藤湖南無法看到五四運動在反日的同時也呈現出明確的民族主義思想。傅佛果（Joshua A. Fogel）著，陶德民、何英鶯譯，《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1866-1934）》（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頁311。野村浩一正是在這一點上，精準地指出內藤湖南與許多日本知識分子所共有的盲點，就是無法客觀察覺日本在近代國際秩序下逐漸形成對中國的侵略關係。

³¹ 子安宣邦著，王升遠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觀》（北京：三聯書店，2020），頁40。

³² 內藤湖南，《支那論》（東京：創元社，1938），頁15。

族主義與地方社會利益，缺乏為國家奉獻的團結心，因而容易受到外國勢力的支配，將中國弱體化的同時，也合理化必須由日本介入才能使其振作的邏輯。「支那」的他者意義，不僅僅是成為排除、蔑視的對象，而更是日本作為東亞的先進國家，在文化相近又相異的關係中，具有介入、引領的資格與責任。

正如開頭引文所呈現的，作為當時臺灣文壇旗手的漢人作家張文環，在中日戰爭方酣的1940年元旦，藉《臺灣新民報》的新年記事回顧去年的文學運動，展現出以日語進行漢人文化題材創作的積極興趣。文中對於戰爭，張文環並沒有流露太多感傷，而是俐落地指出支那事變也促進了「中國文學的研究」的興盛。這裡的研究，毋寧是更接近於文化的推廣或創作資源的運用，因此後面張文環舉出了包括臺灣人、日本人作家的《三國志》、《水滸傳》之日文改寫創作。更進一步的，張文環樂觀地期待這股熱潮也能發展到對於「臺灣的傳說或故事」之發掘。連結「中國文學的研究」、「臺灣的傳說或故事」、「與內地不同的獨特東西」，三者都是日語為媒介進行翻譯性創造，對象則是從中國古典話本到臺灣民俗的「支那」題材。這顯現戰爭情境下，竟使得原先在臺灣的華語語系脈絡在受到壓抑後，以新的形式被重新關注的奇妙現象。³³ 也顯示此時漢人日語作家的某種文學運動思考，正是進行以日語為中介，將中國與臺灣進行連結，化約為一種「中國／支那—日語—臺灣」的模式。在此，日語語系即有可能透過「支那認識」來吸收華語語系的資源，在隱然浮現「日語語系」意識的漢人作家身上，產生更豐富的創作可能性。同樣是1930年代開始活躍的漢人日本語作家吳新榮、呂赫若，也可在其日記史料中，看到他們在中日戰爭後養成日語「支那學」書籍的閱讀習慣，³⁴ 或許也說明了當時透過日語進行的「支那認識」，在臺灣的

³³ 張文環在此時期積極發表對於臺灣的文學運動之論述，除前述〈獨特之物的存在，今年就放開手做吧〉（1940年1月1日），陸續有〈有關臺灣文學的將來〉（臺灣文學の將來に就いて）（1940年3月，《臺灣藝術》創刊號）、〈從事文學的心理準備〉（文学するものの心構）（1941年1月1日，《臺灣新民報》）、〈臺灣文學的自我批判〉（臺灣文學の自己批判）（1941年8月，《新文化》8月號），其中皆將「支那事變」與戰爭視為臺灣的文學運動能夠重振的大好機會。

³⁴ 王惠珍描繪日治後期臺灣知識分子的閱讀私史，並得出結論：在中日戰爭的陰影下，臺灣知識分子能夠得知中國資訊或知識的管道減少，因而只能透過對於支那學讀物的購讀，展開批判性的閱讀。本文則嘗試討論漢人知識分子在中日戰爭後透過

文學運動中的確扮演某些角色，值得進一步探討。下文將以呂赫若為例，說明「支那認識」一定程度啟發了臺灣漢人作家在「日語語系」的創作自覺，並進一步複雜與深化了臺灣漢人日語文學的風格。

四、呂赫若對「支那認識」之理解管道

買了很多書，雖然是與支那有關的，但我認為可以藉由那些書來看臺灣生活。³⁵

這是呂赫若在1943年2月10日寫下的日記內容。這段話或可說明在呂赫若的意識中，「支那」是與「臺灣生活」具有聯繫關係的。這也應和了張文環於前述〈獨〉文的邏輯：從知識面來認知中國，並從而認識臺灣。可說是吸納個人在地經驗於「支那」知識框架的思考方式。此時期的呂赫若和張文環共同經營純文學雜誌《臺灣文學》，該雜誌和《文藝臺灣》並列為當時臺灣文壇的兩大支柱。呂的小說創作受到臺北帝大教授工藤好美、瀧田貞治等評論者高度評價，同時也積極進行音樂與演劇活動，交遊廣闊，可說是1940年代初期臺灣藝文界的閃耀之星。過去對於呂赫若的前行研究中，學界已從臺灣左翼文學、戰爭時期臺灣文學場域建構、臺北帝大學者的學術資本影響等多元的角度進行探討，³⁶但對於呂赫若閱讀的「支那」相關書籍，是否對其創作有所影響，仍未有深入討論。本節將先整理呂赫若日記中對於「支那」相關主題的閱讀與視聽狀況的紀錄，並討論此與呂赫若在1940年代初期小說創作主題轉變間的可能關連性。

這份呂赫若的日記全部以日文書寫，始自1942年1月1日，結束於1944年12月17日，橫跨了呂赫若在東京從事音樂活動的末期，以及返回臺灣，主

支那學讀物認識中國的積極意義。王惠珍，〈戰前臺灣知識份子閱讀私史：以臺灣日語作家為中心〉，《臺灣文學學報》16期（2010），頁33-52。

³⁵ 呂赫若，《呂赫若日記》（臺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頁50。以下引呂赫若日記內容皆為筆者自該書翻譯。

³⁶ 參陳映真等，《呂赫若作品研究》（臺北：聯合文學，1997）、朱惠足，《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臺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臺北：麥田，2009）、垂水千惠著，劉娟譯，《奮鬥的心靈：呂赫若與他的時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張文薰，〈一九四〇年代臺灣日語小說之成立與臺北帝國大學〉，《臺灣文學學報》19期（2011），頁99-132。

要在臺北進行文學及相關活動的時期。³⁷ 相對於中國的官方與民間都嚴重抵制「支那」一詞，呂赫若卻在日記中相當頻繁且自然地使用「支那」。如果彙整此期間呂赫若閱聽的全部「支那」相關題材紀錄，主要在1年8個月內，包括書籍及電影、戲劇作品數量來計算的話，至少達到36種。在此排除通俗性質較強的電影，³⁸ 主要以「支那」相關閱讀書籍進行分析，列出如【表一】。

【表一】 呂赫若日記（1942-1944）可見之「支那」主題書物閱讀

中國文學	古典：《紅樓夢》、《浮生六記》、《還魂記》、《桃花扇》、《山海關》、《好逑傳》、《今古奇觀》、《詩經》、《楚辭》（共9種） 現代：《北京好日》（林語堂著）、 ³⁹ 《駱駝祥子》（老舍著）（共2種）
研究書籍	《北支》雜誌（第一書房出版）、《臺灣風俗誌》 ⁴⁰ （片岡巖著）、《詩人に通じて見たる支那文化》（上村忠治著）、《兵法三国志》（田中久著）、《三国志》、 ⁴¹ 《西太后に待して》（齡著）、《支那人氣質》（Carl H. Crow, 關浩輔譯）、《東洋哲學夜話》（Lily Adams Beck著, 陶山務譯, 1942第一書房）、《滿支習俗考》（井岡咀芳著）、《支那の演劇》（Lewis Charles Arlington著, 印南高一、平岡白光共同日譯）、《支那思想の研究》（高田真治著）、《支那史研究》（市村瓊次郎著）（共12種）
其他	《乾隆御賦》（長与善郎著）（共1種）
總計：24種	

³⁷ 本文以下引用呂赫若日記，皆採用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年復刻的版本，引用時標註呂記錄之日期。參呂赫若（2004）。

³⁸ 《珠江》、《木蘭從軍》、《西遊記》、《成吉思汗》、《鴉片戰爭》（阿片戰爭）、《陸軍航空戰記》、《海軍戰記》、《戰爭的城鎮》（戦いの町）、《望樓的敢死隊》（望樓の決死隊）等共9種。

³⁹ 臺灣的通行版本為《京華煙雲》。林語堂*Moment in Peking*甫在美國出版，就在日本被不同出版社積極翻譯，集中在1940年，就出現了三個版本，顯示了當時日本讀書市場對於「支那」的閱讀熱。譯為《北京好日》者即為四季書房的版本。河村昌子，〈戰時下日本における林語堂の邦訳〉，《千葉商科大學紀要》45卷3期（2007），頁51-64。

⁴⁰ 此處將《臺灣風俗誌》列入支那主題閱讀，是因片岡巖的寫作意識來自於危懼「支那民族迷信的根深柢固」對臺灣社會造成的不良影響，故顯然也在「支那認識」建構的脈絡之中。片岡巖，《臺灣風俗誌》（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頁12。

⁴¹ 版本不明，疑可能為前述《兵法三国志》之簡稱。

從此表可以勾勒呂赫若此時閱讀取向的輪廓——積極瞭解日本支那學研究成果的同時，也接觸中國文學，但以古典作品為主，只有較少數的現代中國文學。⁴² 只是在呂赫若留下閱讀紀錄的《紅樓夢》等九種古典作品中，若檢索日本國會圖書館之館藏，可發現日本於戰前全部皆有出版日譯版本。其中《好逑傳》、《今古奇觀》亦曾由喜愛「支那趣味」的文學名家佐藤春夫翻譯部分篇章。呂赫若很可能在立志翻譯紅樓夢，以及發願為了創作要「讀破古典作品」⁴³ 的同時，也參考了這些日譯版本。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1930年代，呂赫若的作品在左派思維層次上與中國創作社群連結（如胡風在《山靈》編譯呂赫若的作品〈牛車〉），此時期的呂赫將「支那」與「臺灣生活」連結的方式，卻增加了從古典文化汲取資源的面向。對於中國古典作品之解讀，呂赫若一方面積極借助高田真治、市村瓊次郎、上村忠治等支那學者的論著，同時參考紀實性的《北支》雜誌，另一方面，也不排斥從西方漢學家或記者的眼光來認識「支那」。

如此積極閱讀中國古典作品與支那學讀物，呂赫若思考的正是將其實踐於文藝創作之上。「對東洋的哲學、道德不更加全盤學習不可。因此，不能不對日常生活做正確的生活體認，以活用於好的作品上。」（1943年4月25日）、「研究支那非為學問而是我的義務，是要知道自我（自己を知る）。想寫回歸東洋、立足於東洋的自覺的作品。」（1943年6月7日）且先不論「東洋」與「支那」間的辯證，此處呂赫若佐證了這份書單，大部分是為了準備寫作參考資料所讀。

呂赫若在1942年3月3日購買了兩本《北支》雜誌，並接著說明「想把中國人的生活史、《紅樓夢》改寫成戲劇。」這並不是他在日記中唯一一次提到《紅樓夢》，在3月及12月時呂赫若更提到要將《紅樓夢》翻譯出來，使其廣為流傳，並認為「這是我身為臺灣人的義務」，可惜目前尚未發現呂赫若有發表或遺留下來《紅樓夢》相關的譯稿、劇作。呂赫若此處的紀錄，無法用簡單的臺灣民族主義或中國民族主義加以解釋。如果呂赫若在1940年

⁴² 客觀而論，這數字未必高於呂赫若飢渴閱讀的歐美文學戲劇作品，但仍可以說是相當可觀了。若鎖定在呂赫若於小說或劇本、綜合雜誌以外的閱讀，雖然也有閱讀譯自歐美的戲劇理論等書，但占極大比重的則是「支那」主題的研究著作。

⁴³ 記於日記補遺欄，日期註明為1944年1月1日。呂赫若，《呂赫若日記：手稿本》，頁396。

代初的寫作，只是單純想保留與描寫臺灣的民俗文化，那為何要積極地推廣《紅樓夢》這部刻劃中國傳統大家族興衰的古典小說呢？同時，為什麼主題設定在中國華北、且強調紀實性的《北支》雜誌會在日記中被與《紅樓夢》的翻譯聯繫在一起呢？

《北支》月刊雜誌是由東京的「第一書房」出版，並且號稱「經由實地現場編輯的唯一『北支』文化介紹雜誌」。⁴⁴ 從這樣的宣傳詞可見「實地現場編輯」所帶有的自信感。翻閱內容，的確可以看見大量清晰照片，呈現華北地區各種自然、人文與社會風貌。這些照片本身就具有宣傳戰爭的正面意義效果，因為可以看到許多中國人民安穩與快樂生活的景象，甚至表現了在日本政府協助下獲得更多現代文明的建設。對於日本人而言，則敘說了經略中國大陸豐沛的資源可以帶來的經濟發展。也就是說，雖然是以圖文介紹華北文化，但也使讀者在道德與利益上認同中日戰爭的意識形態。⁴⁵

「第一書房」這家出版社其實積極瞄準戰爭帶來的閱讀熱，在支那事變後推出「戰時體制」版的系列叢書，號稱以提升戰爭中，國民之世界與文化認識為目標，系列包括日本、中國、西洋各種經典讀物的翻譯或介紹書籍，《北支》的扉頁廣告也可看到第一書房出版《水滸傳》、《三國志》、賽珍珠的《大地》等日本人認識中國的重要書物。呂赫若也留下到銀座的第一書房閱讀書籍的紀錄，⁴⁶ 代表這可能是他習慣駐足的書店。1942年5月回到臺灣後，呂赫若維持閱讀「支那」書物的習慣，也曾購買同是第一書房出版的《詩人を通じての支那文化》、《東洋哲學夜話》。《詩人を通じての支那文化》介紹陶淵明、李白等中國重要古代詩人，而呂赫若的小說〈清秋〉之中，主角也在返鄉時閱讀著「支那の詩人の傳記」，一邊欽羨著祖父吟詩種菊的悠然生活，感受著「孝道」的重要，以及中國文化和日本的相通之處。由此可以推測，不僅是《詩人を通じての支那文化》成為呂赫若的創作材料，第一書房出版的支那學讀物也都是呂赫若閱讀並理解中國的重要來源之一。

⁴⁴ 華北交通株式会社資業局資料課編，《北支》5卷3期（1942）。

⁴⁵ 有關日本政府利用攝影來進行戰爭宣傳的研究，可參 顧錚，〈戰爭的理由、視覺表徵與上海——木村伊兵衛與原弘的「上海」攝影特輯（1937-1938）〉，《社會科學》1期（2009），頁150-159。

⁴⁶ 1942年2月22日。呂赫若，《呂赫若日記》，頁58。

除了「第一書房」之外，觀察前述【表一】的「支那」研究書籍，其中由日本東洋學學者所撰寫的書籍，通常具有較客觀嚴謹的學術性質，但也並不能脫離日中戰爭的情境。在1943年6月5日呂赫若購買的《支那思想の研究》，由東京帝國大學的高田真治教授所撰，彙整了十數年以來的研究成果，介紹了天命、性、學、孔老諸子思想等經典研究成果，而在最後一部分詳細說明了作者對於日本人應該如何攝取「支那」思想的看法。高田認為，日本確受到「支那」上古以來思想影響很深，為此也必須深入了解「支那」思想，但是必須思考如何取捨；以「忠孝」思想為例，日本的忠孝是一體的，也就是所謂的「忠孝一本」，一切以忠君為依歸，「支那」在上古的論語、孝經、禮記也都有類似的思想，但因為後世「異姓革命」的現實，而導致無法實踐。⁴⁷ 高田真治所要強調的是，即使在日中發生戰爭、皇道高唱的現下，也不該完全將「支那」視作敵國，甚至加以貶抑排斥，因為其上古文化與日本的國體是共通的，應該思考如何將「支那」的「王道」和「皇道」結合，使其更加完美。⁴⁸ 高田展現了身為中國古典思想研究者的專業素養，但當他嘗試將「支那」思想與日本思想結合的同時，卻也繼續複製對於中國人的刻板印象，因為「支那的民族性比起國家意識，家族意識更強，比起對國家的義務意識，對家族的團結意識更強」，⁴⁹ 此處的敘述可說延續了內藤湖南對「支那」自主難以形成國家的斷定。而高田真治也強調對於忠孝不二的思想，「在支那雖然能將其作為理想表現，卻沒有辦法實現，但不能不說在日本卻是可以完全實現的」而這正是因為日本具有「冠絕宇內之國體」，⁵⁰ 也就是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緣故。也就是說，在呂赫若積極閱讀的「支那學」相關著作中，可以看見其內容就如同內藤湖南一樣對「支那」文化抱持極高敬意，但在現實政治的問題上，卻一再強調當代的「支那」難以形成自主的國家意識，甚至暗示日本介入中國政治的正當性，⁵¹ 此即「支

⁴⁷ 高田真治，《支那思想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39），頁568。

⁴⁸ 高田真治，《支那思想の研究》，頁572-574。

⁴⁹ 高田真治，《支那思想の研究》，頁569。

⁵⁰ 高田真治，《支那思想の研究》，頁571。

⁵¹ 另外同樣是呂赫若閱讀的支那學讀物：市村瓚次郎《支那史研究》，透過對於明代滿洲之女真族活動狀況的考察，建議日本在發展對滿洲的植民政策時，應參考滿族透過在東蒙古樹立政權而成功向南往「支那」發展勢力的經驗。市村瓚次郎，《支那史研究》（東京：春秋社，1939），頁471-472。井岡咀芳則強調在日支戰爭的局

那意識」之具體呈現。

若使用邵軒磊所分類的「參照物」與「對象物」，呂赫若除了透過諸多支那學書籍學習以現代學術方法理解作為對象物的「支那」的同時，顯然也在思考如何於創作中運用這些知識的同時，將「支那」作為參照物。此時，呂赫若並非僅僅只是關心與臺灣漢人文化或關係較緊密的華南地區文化，而是更廣泛性地將目光投向包括華北、東北等地，將「支那」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與臺灣的關係。透過《北支》雜誌，呂赫若所連結的也並非僅僅是文化性、符碼性的傳統中國，而是在視野中同時看到被日本帝國納入支配的現代中國，以及在抵達這樣的現實之前的數千年歷史軌跡，將其整體性地作為「支那」來理解。呂赫若將之參照作為描寫臺灣漢人家族的資源，心中描繪的應是一些存在於臺灣與「支那」的傳統社會結構之共性。在其1940年代初期創作的一系列漢人家族主題的小說中，我們特別可以看到呂赫若對於地方地主形象、家族「孝道」的結構之描寫，正是將個人經驗以「支那認識」的框架進行參照與重新理解之後的成果。

五、地方社會再現與臺灣漢人家族的諷刺性構圖

呂赫若筆下的鄉土往往與對象保持著客觀的距離。觀察到40年代戰爭結束前備受重視的〈石榴〉（柘榴）、〈財子壽〉等傳統家族描寫，呂赫若對於在鄉土中的個人因為無知、自私、軟弱、短視近利等性格或能力的侷限性，而造成的戲劇性變化，有著極大的興趣。他在日記寫道：「我並不是不會寫以人的個性美為對象的小說，而是一直更想寫以社會為對象，描寫人的命運的變遷。」⁵² 呂赫若以彷彿解剖刀的筆法，⁵³ 剖析在臺灣漢人家族倫理中活著的人們的行動邏輯，以好奇的眼光，注視各種奇妙的病徵之生成原

勢下，正是扭轉過去支那及日本過度依存歐美之惡習，專注東亞獨自文化的契機，日滿支文化的相互了解正有助於此情勢的發展，亦連結了中日戰爭與「支那」研究的關係。井岡咀芳，《滿支習俗考》（東京：湯川弘文社，1942），頁1-3。

⁵² 1943年6月13日。呂赫若，《呂赫若日記》頁182。

⁵³ 臺北帝大教授瀧田貞治語。形容呂赫若「為了將舊慣習俗呈現公眾周知而揮舞著手術刀加以剔抉」，出自氏著〈呂赫若君のこと〉。呂赫若，《清秋（日本植民地文學精選集39）》（東京：ゆまに書房，2001），頁2。

因。呂赫若小說中描寫漢人家族倫理關係的許多元素，或許可以從他的家庭背景或個人經驗找到直觀的解釋，但本文意不在此，而是企圖彰顯其小說文本並非僅是在地經驗的如實呈現，其生產的過程與「支那認識」的知識框架有著緊密關係。

呂赫若1940年代初的作品與此前最明確的差異，在於開始將臺灣的民俗與漢學元素放入故事，作為角色行動的布景。而這也正是此時期臺灣漢人作家普遍的轉變現象，甚至也可見於庄司總一等在臺日人的創作。正如張文薰曾經指出的，從1930年代到1940年代前期的臺灣漢人小說，具有從強調左翼普世理論的「共性」轉換到強調地方色彩的「特性」之差異，其中「知識」成為小說構成的重要基礎，使得作者得以詳細建構各種角色與情節所立基的民俗、空間、歷史。⁵⁴ 1944年的小說集《清秋》，是由呂赫若挑選發表於1942年至1943年的6篇短篇小說，再加上專門寫就的〈清秋〉一篇，不按照發表時序而集成，自有新的理路。⁵⁵ 呂赫若曾在日記寫道：「思考文學運動的型態，應該憑藉單行本吧」，⁵⁶ 以上皆可見《清秋》整體的主題與結構，在其眼中具有重要的意義。《清秋》收錄的作品順序與初出時期如下。

- (一) 鄰居：1942年10月《臺灣公論》10月號
- (二) 石榴：1943年《臺灣文學》秋季號
- (三) 財子壽：1942年《臺灣文學》夏季號
- (四) 合家平安：1943年《臺灣文學》夏季號
- (五) 廟庭：1942年《臺灣時報》8月號
- (六) 月夜：1943年《臺灣文學》春季號
- (七) 清秋：1944年3月⁵⁷

從主題來看，〈鄰居〉講述內臺人的交往，〈石榴〉是兄弟之間的分離，〈財子壽〉、〈合家平安〉描寫某個傳統家族的衰落，〈廟庭〉、〈月夜〉寫家族的封建思維下女性的悲劇，〈清秋〉則寫知識分子對戰爭局勢的

⁵⁴ 張文薰，〈一九四〇年代臺灣日語小說之成立與臺北帝國大學〉，頁126。

⁵⁵ 未收入已發表的〈風水〉、〈一年級生〉。此處無法深入討論未收錄的理由，但〈風水〉呈現之利慾薰心老人的形象，似乎與〈財子壽〉描寫的內容有相似之處，可能是因為篇幅所限，在題材重複性的考量下有所割捨。

⁵⁶ 1943年5月27日。呂赫若，《呂赫若日記》，頁163。

⁵⁷ 據呂赫若日記，於1943年10月23日脫稿。呂赫若，《呂赫若日記》，頁322。

應對。看似沒有明確的統一性，卻是同一主題，即「何謂家族？」的不同面向之探索。當然，此處指的是具有鮮明漢人文化特色的家族型態。臺北帝大教授瀧田貞治為《清秋》寫的序就指出呂赫若的小說世界大體由「臺灣的大家族制度及與糾纏難解的種種舊慣習俗」所構成。⁵⁸《清秋》中的諸篇作品各自在進行充足細膩的場景鋪陳後，往往將讀者帶入支撐故事主軸的人際關係之中。這裡的人際關係，並非像早期〈牛車〉、〈暴風雨的故事〉那樣呈現明快的「剝削—被剝削」或社會變遷的圖像，也不是〈婚約奇譚〉、〈前途手記〉那樣立基於都市複雜的現代性，而是深植於鄉村或市街的地方人情土壤。除了〈鄰居〉以外的6篇故事皆構築在鄉村的地主、佃農、食客、姻親、養繼子、屋舍租賃等種種縱橫交錯的關係之上，而〈鄰居〉雖是在講在臺日人帶走臺灣人小孩的故事，其中臺灣人母親的無法為自己辯護，無法用更好的照養環境來反對日人夫妻對孩子的照料，也正是由於其家庭深深體現了「本島人貧民窟地帶」情境之緣故。⁵⁹ 比起較早期的作品，呂赫若展現了更加熟練與細膩的筆法，呈現角色身處與行動的人際網絡為何，而且具有濃烈的地方感。這些人物都顯得處處受到制約，沒有強大的意志與行動力可以甩開周遭的人情負荷，但這正是傳統地方社會的特色。若我們對比前述日本支那學者所描繪的只知有家族、不知有國家的漢人地方社會，可以發現家族觀念正是其間共通性。

若進一步聚焦於「地主形象」和「孝道」的描寫來探討，這種作為社會制度的家族觀念之作品命題將更為清晰。過去在呂赫若具有左翼傾向的作品中，多設定為封建社會剝削者角色的地主，在《清秋》已經被轉換為更加複雜的形象。一言以蔽之，呂赫若在呈現出這些地主領導的臺灣傳統家族之諸多弊病的同時，也描繪出其結構的難以改變，其實是許多行動者彼此支持的結果，地主不是唯一的決定者。在〈財子壽〉中，繼室玉梅腦中烙印著戲曲〈大舜耕田〉的孝親教訓，而對周海文家族的蠻橫百依百順。⁶⁰ 〈合家平安〉裡，我們可以看到比楊遠在1936年的小說〈田園小景〉所描寫作為剝削

⁵⁸ 呂赫若，《清秋（日本植民地文學精選集39）》，頁1。

⁵⁹ 日人夫妻批評臺灣人生母在孩子生病時，只想帶他去和開漳聖王拿草藥而不去看醫生，即為一例。呂赫若，《清秋（日本植民地文學精選集39）》，頁24。

⁶⁰ 呂赫若，《清秋（日本植民地文學精選集39）》，頁83。

者的鴉片鬼地主⁶¹ 更加生動的形象，例如地主范慶星豢養可以拉琴說書的食客，因鴉片形成共生關係，在大厝中一同享受京劇或說書、唸歌，但在鴉片漸禁政策下反被食客勒索：

迄今受他照顧的鴉片吸食者，這次反而拿著自己的指定分量，以加倍的價格賣給范慶星。假稱要幫范慶星加工鴉片，卻盡情與他一起吸食，叫他如何承受得了。玉鳳開始擔心，卻已經為時已晚，家產的田地已一甲步一甲步化成范慶星鴉片煙管的菸消失了。⁶²

而更為有趣的是從佃農角度進行敘事的〈石榴〉。在此，地主以「父老」之姿成為貧農的情感寄託。地主「福春舍」幫助失怙的貧農三兄弟各自找到寄養家庭而得以溫飽，「是財富之家同時也是讀書人，日常的生活指導與困難都要麻煩他」，⁶³ 在貧農兄弟的眼中具有極高的威嚴。在這組關係中，福春舍正是透過漢文的教養，來讓貧農對其產生情感之依附。貧農兄弟因寄養不同家庭而骨肉散居各處，大哥金生因精神失常的三弟突然失蹤，只好求助於福春舍，福春舍只是簡單吟詠《論語》的「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沒有給出任何解決方案，卻讓金生感到豁然開朗，感嘆福春舍真是偉大。⁶⁴ 直到故事結尾，這位地主都存在著雙重曖昧性，因為故事似乎暗示了三弟之所以精神失常，可能與被寄養的陰暗、孤單、貧窮的家庭環境有關。這位地主讓三兄弟各自寄養到他的親戚家族中，也可能是將他們束縛在鄉村的租佃剝削關係之中，失去到都市自力更生等新的可能。大哥金生不惜擾動現在入贅生活的平靜，請求地主協助將次子過房給去世的三弟，則是由於對於家族零散的愧疚。故事中，大部分社會關係的改變都必須尋求地主的最後裁決，佃農對他的情緒則是感恩多於懷疑。呂赫若並沒有透露何謂救贖的解答；然而，正是對於徒具形式卻支配個人情感欲求與行動選擇的「孝道」，以及地主的曖昧意義所進行的深入描寫，顯示呂赫若致力於從各種面向描寫

⁶¹ 楊遠，《楊遠全集 第五卷·小說卷（II）》（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9），頁1-41。

⁶² 呂赫若，《清秋（日本殖民地文學精選集39）》，頁157。

⁶³ 呂赫若，《清秋（日本殖民地文學精選集39）》，頁42。

⁶⁴ 呂赫若，《清秋（日本殖民地文學精選集39）》，頁43。

以家族觀念為軸心的臺灣社會複雜性；貧農並非只是資源匱乏的受難者，地主也並非單純的剝削者，而其實是深植於地方社會牢固的相互關係之中。

另一方面也可看到呂赫若對漢人家族「孝道」的特殊描繪。如前所述，〈合家平安〉這部作品生動描繪家族上下積極復興，到城市邊緣經營餐飲的過程，這可說是「孝道」的積極展現；但若從敘事安排來看，面對無法自我克制的鴉片鬼家長，這樣的努力終歸是徒勞的，這也讓「孝道」的探討在此被抹上了無力的色彩。最終，故事結尾是由親戚強制將其送至醫院戒治，「醫院」此一近代體制象徵的介入，正說明了近代科學技術在解決停滯局面時，擁有凌駕於家族孝道的強大力量。⁶⁵ 〈廟庭〉、〈月夜〉中描寫了即使知道女兒遇人不淑仍不允離婚，導致自殺事件的保守家長。但這位在面對已成知識階級的姪兒（敘事者）時露出「不安而卑屈的笑容」⁶⁶的老人，動機顯然是迫於地方社會的輿論壓力與嫁妝損益而不敢有所行動。受到倚重而欲伸出援手的知識分子敘事者，面對同為女性卻成為加害者的婆媳關係，卻只能徬徨、憂鬱、手足無措而無法行動，坐視悲劇發生。此處，呂赫若描寫的孝道倫理，毋寧是負面、無力、甚至是封閉而與時代脫節的。同時，他也屢次塑造背負解決問題期待、卻退縮不前的知識分子角色，來呈現地方社會問題的沉重難解。最後嘗試以〈清秋〉這篇小說來說明，呂赫若如何在其中同時描繪地方社會中地主形象，與看似崇高，實則虛渺的孝道。呂赫若的〈清秋〉專為此作品集所作，篇幅占了全書三分之一，又以它命名，可見本篇在這部單行本中的中軸意義。呂赫若在《清秋》的後記說道：「自己這幾年的創作就像不斷尋找巢窩的小鳥一樣四處逗留，雖然早就知道最後歸巢在哪。」⁶⁷ 因此可以理解這近兩年的創作，呂赫若是多方嘗試，試圖以〈清秋〉作為階段性的歸向所在。呂表示，這篇小說的目的是「想描寫當今的氣息，以明示本島知識分子的動向。」⁶⁸ 內容也的確涉及戰爭動員的問題。故事大要為：從東京習醫歸來的青年耀勳，雖然理想是從事研究，但經歷內心

⁶⁵ 在呂赫若所稱許的庄司總一《陳夫人》第一部（1940）小說中也可看到鴉片成癮的地主被而子送進醫院進行現代醫療戒治之情節，第一部的結尾即為該地主逃出醫院而因鴉片病死。庄司總一著，黃玉燕譯，《陳夫人》（臺北：文英堂，1999），頁224。

⁶⁶ 呂赫若，《清秋（日本殖民地文學精選集39）》，頁192。

⁶⁷ 呂赫若，《清秋（日本殖民地文學精選集39）》，頁338。

⁶⁸ 1943年8月7日。呂赫若，《呂赫若日記》，頁241。

衝突與戰爭時局的潮流，終於下定決心聽從父親的要求，在鄉間開設診所，好好地堅守崗位服務鄉里、孝養家族。

〈清秋〉中的鄉土看似美好，其實存在著壓抑主角耀勳追求遙遠理想的作用，此點已有許多研究者點出。⁶⁹ 更進一步分析，與〈石榴〉中的地主類似，耀勳的祖輩、父輩皆為殖民地基層官吏而順利保持家業及地位，故事中也暗示耀勳家與鄉人間存在經濟壓迫的關係。因而，鄉土的「父老」存在著正反兩面曖昧詮釋的可能。另一方面，在精打算盤的耀勳父親眼中，所有考量都以家族利益為優先，全未在意時代變動與戰爭動員，更完全無法理解留學日本的兒子的苦惱。這是〈清秋〉進一步比此前篇章更加深入描寫的主題。身為知識分子的耀勳眼中，看到鄉土充滿問題，產生強烈的徬徨，於是將情感寄託於前清秀才的祖父身上，轉移對勢利父親的不滿，以抽象的「支那」文化之美壓抑對家族全體的不安懷疑。「支那」詩人、漢學、科舉等話題在主角耀勳與祖父互動的過程閃爍出現，正是構築前述鄉土美景的關鍵性元素。鄉土生活因為保存著「支那」的深厚文化底蘊，而對身為習於都市節奏的耀勳產生了神祕的吸引力。〈清秋〉的大多篇幅呈現「遲延」的構造，⁷⁰ 就是在呈現知識分子對於家鄉的「孝道」表象之下，種種問題卻被壓抑的不安。在故事最後，耀勳終於下了決定，卻也並非來自自身的判斷，而是由於突發的國家徵召事件，半推半就地接替鄉中前往南洋的醫師。故事結尾，耀勳安慰自己總算是「盡了孝行之道」，⁷¹ 看似頓悟昇華，實際上卻呈現出知識分子對國家動員正當性其實被動無力，就如同對於家族孝道和鄉土剝削關係都是被動跟隨的諷刺構圖。

積極閱讀中國古典作品，以及學習「支那學」書物，在日記中寫下「東洋自覺」等語的呂赫若，其實已冷靜地觀看漢學在地方社會發揮的作用：擁

⁶⁹ 施淑，〈最後的牛車——論呂赫若的小說〉，《兩岸文學論集》（臺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頁131-138；垂水千惠著，劉娟譯，《奮鬥的心靈：呂赫若與他的時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張文薰，〈「鄉土」的安魂曲：1940年代日語小說的空間分析〉，《戰鼓聲中的歌者——龍瑛宗及其同時代東亞作家》論文集（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11），頁323-348。

⁷⁰ 最早提出「延遲」結構解讀的為垂水千惠（2020），但其只強調主角個人的立身出世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也就是「近代—反近代」的構圖，本文則認為呂赫若的野心不僅如此。

⁷¹ 呂赫若，《清秋（日本殖民地文學精選集39）》，頁335。

有漢學資本的人物，確實連結著地方社會的某種文化感情，但可能也就僅止於情感而已。就如同〈合家平安〉中，家產散盡的范慶星因為擁有漢學資本而依然受到愚昧的鄉人尊敬，但沒多久就因毒癮而出現原形。冷靜寫下前述諷刺圖像的呂赫若，不管是對漢學或孝道的描寫，都突顯了其在時代變遷下漸漸失效、或得以被挪用的脆弱性。如〈清秋〉中，家族獲知耀動的弟弟擅自決定在國策召喚下前往南方服務，祖父以一句「南方是現今的年輕人摩拳擦掌的地方」⁷²平息了父親的不滿，得到主角耀動的尊敬，但在看似寬容的家族互動中，應和國策的知識份子，其內心種種的糾葛與徬徨，並未得到對話的可能。不管是漢人的傳統家族文化，或立基於「支那認識」的東洋自覺，甚至知識分子在國家動員下的去就，在臺灣題材的文學實踐中，其實都成為得以被解剖刀冷靜處理的客觀之物。

這也正是呂赫若描寫的地方社會之共同傾向。呂赫若雖然透過更深入而複雜的人情糾葛、嚴肅或通俗的漢學文化等等元素，使得其在描寫臺灣漢人生活的各個面向都更加深入而有說服力，但也傾向於呈現出其與時代脫節、陰暗保守遲緩的形象，連返鄉的知識分子都因身處情感纏繞中而難以改變。而這樣的地方社會，其實也可以說是精準轉化了前述內藤湖南、高田真治所形塑的「支那認識」中，那種只以家族、宗族的自利考量為優先，無法期待內部革新力量發揮效果的形象。不同的地方在於，呂赫若於《清秋》等作品中，對地方社會採取冷靜、壓抑臧否的客觀視角，一方面將「支那認識」作為客觀性的整體認知框架，再結合了自身親近的鄉土經驗，透過諷刺性的筆法，彰顯出地方社會人際互動中難以用理性分析，亦難以化約的情感依附關係；雖然筆觸冷靜，但其糾葛細節總是意在言外、勾人心弦，意外地呈現出日本知識分子持「支那認識」從外部觀看的未盡之處。

1941年5月，針對在臺日人作家庄司總一的小說《陳夫人》成功改編戲劇並在東京上演，呂赫若在《興南新聞》刊出連續6回的〈「陳夫人」的公演〉一文，表達了興奮之情，雖惋惜該劇無法在臺灣首先上演，也表達了對於臺灣的事物（臺灣のもの）能受到藝術性的改編而感到滿足。呂對小說和改編戲劇的演出給予許多建議，包括場景設計、語言呈現、角色神態等等表象臺灣人生活的方式，其中對於「言語之問題」，呂赫若惋惜，因為是在日

⁷² 呂赫若，《清秋（日本植民地文學精選集39）》，頁280。

本上演，沒辦法把小說中的臺灣話對話呈現出來，而提出作為參照，在永樂座上演的《留鬚的天使》（髭のある天使）一劇，⁷³ 是採取中國人角色說中國話，再透過通譯角色翻譯成日文的方式來自然呈現對話，又能讓日本人觀眾聽懂。⁷⁴ 這也讓人思考，呂在日記中自問：如何對民族更有貢獻，難道不也是在思考臺灣（漢）人的文藝作品，能否在日語語系中獲得更高評價嗎？在此，我們依然看到王德威所描述的「華夷變態」，呈現在日語語系對華語語系資源的翻譯與地位列序：華語語系資源不願消失，就必須進行翻譯；或是阿里夫·德里克所提醒的「空間」對地方強加同一性或共性的權力關係，也持續發生威力。不僅是戰爭動員，臺灣漢人族群作為日本帝國的統治對象，即使在文學生產中，也被迫使不斷思考自身在日語語系中的貢獻為何，以尋求重視。

六、結語

相較於一些評論者認為呂赫若作為一位臺灣人日語作家，其寫作主要在「反封建」、「維護臺灣人的尊嚴」，⁷⁵ 或「寫出只有臺灣人而非殖民者所能理解的『地方文化』」，「傳統的倫理情感……仍然完好地保留」；⁷⁶ 本文提供另一個視角，認為日本帝國在他者化漢文化以建構主體的同時，也積極形塑對於「支那」的科學性、系統性之論述，並且透過日語教育的推廣、文化體制的建立，讓彼時如呂赫若這樣的臺灣人知識分子，獲得重新理解「中國」的特殊框架，並藉此確認、強化自身在日語語系中創作的策略位置。呂赫若這個饒富趣味的個案，顯示了一位在日語語系的脈絡追求世界文

⁷³ 據呂赫若所述，此為興亞新劇團和「ロッパ一座」合作製作，興亞歌劇團據說由原抗日八路軍組成。據網站「澀澤社史資料庫」（澀社史データベース）的「（株）東京宝塚劇場『東宝十年史』」，該劇曾於1941年4月2日於永樂座上演，與呂赫若所述時間相符。網站記述該劇全名為「陸軍省報道部後援山西省建設 記 髭のある天使」，顯見內容應為戰爭宣傳劇。網址：<https://reurl.cc/V1G2xQ>（2022.10.25徵引）。

⁷⁴ 塚本照和，〈再録呂赫若〈「陳夫人」の公演〉〉，《中国文化研究》16期（1999），頁39-60。

⁷⁵ 呂正惠，〈殉道者——呂赫若小說的「歷史哲學」及其歷史道路〉。《呂赫若小說全集（下）》（新北市：印刻，2006），頁661、684。

⁷⁶ 陳芳明，〈廢墟之花〉，《呂赫若小說全集（上）》（新北市：印刻，2006），頁31。

學之理想價值的漢人臺灣作家，⁷⁷以「支那認識」重新詮釋何謂「臺灣」，並且豐富了臺灣漢人家族的文學形象。呂赫若必須在日語語系的框架中再現臺灣文化與人際情感的壓力，則讓他的作品得以將生活經驗提煉至藝術的層次。呂赫若的創作成果獲益於「支那認識」，卻也突顯「支那認識」的侷限，對臺灣漢人家族有刻板化的現象。同時，相較於找出臺灣人有別於「支那」的特殊性，呂赫若更傾向於將臺灣人的民族性放在整體「支那」的視野下進行思考。呂赫若在日記中堅持紅樓夢、孟姜女的戲劇化「非得由我們臺灣人自己來做」的意義，正說明了他以臺灣人的特殊位置出發，得以將「支那」放入日本帝國的日語語系框架。這也是透過日本帝國形塑的「支那」來重新認識「自我」（自己を知る）。在此，我們也看到「經驗—知識—文學生產」之間，連續轉化與不斷折衝的關係。

過去對於華語語系的討論，較偏重於華語語系如何發生「在地化」的問題，或是對其反駁；但看待語系（-phone）問題時，顯然也必須關注其他強勢語系的競爭關係，以及看似在地化的書寫，其實也內存知識框架的中介。在本文的呂赫若案例可以看到，「支那認識」成為日語語系試圖整合臺灣的在地漢文化進入日語語系之重要工具。近代日語語系與華語語系發生的彼此競爭，不完全是曾為遷占殖民者的後者如何在地化、或者被前者取代的問題。在彼此的激烈衝突下，例如戰爭情境中，華語語系仍然可能同時成為被殖民者進行自我文化復振的資源，例如以中國、支那為源頭的古典文學、漢學等——即使在臺灣人眼中的「支那」，可能已經與彼岸的「中國」之自我認知有相當大的不同。從日語語系的觀點來說，呂赫若的文學實踐也具備逸脫以「日本語／大和文化」為中心，支配「支那」的想像之可能。

本文並非要主張呂赫若的文學創作被「支那認識」所滲透或收編，或者意圖主張呂的創作超越了後者，而是企圖檢證在此一轉換機制的作用下，臺灣文學運動不僅止於對臺灣此地的認同，而更因為對日本、中國文化共性的吸收與轉化，反而更加豐富，值得今日借鑑。

⁷⁷ 張誦聖，〈戰時臺灣文壇：「世界文學體系」的一個案例研究〉，《臺灣文學學報》31期（2017），頁1-31。

引用書目

- 子安宣邦著，趙京華譯，《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 ，王升遠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觀》（北京：三聯書店，2020）。
- 井岡咀芳，《滿支習俗考》（東京：湯川弘文社，1942）。
- 內藤虎次郎，《內藤湖南全集 第五卷》（東京：筑摩書房，1976）。
- 內藤湖南，《支那論》（東京：創元社，1938）。
-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館藏系統，<https://www.ndl.go.jp/>（2022.10.25 徵引）。
- 片岡巖，《臺灣風俗誌》（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
- 王惠珍，〈戰前臺灣知識份子閱讀私史：以臺灣日語作家為中心〉，《臺灣文學學報》16期（2010），頁33-52。
- 王德威，〈華夷之變：華語語系研究的新視界〉，《中國現代文學》34期（2018），頁1-27。
-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臺北：聯經，2017）。
- 市村瓊次郎，《支那史研究》（東京：春秋社，1939）。
- 任達（Douglas R. Reynolds）著，李仲賢譯，《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 吉澤誠一郎，《愛國主義の創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みる》（東京：岩波書店，2003）。
- 庄司總一著，黃玉燕譯，《陳夫人》（臺北：文英堂，1999）。
- 朱惠足，《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臺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臺北：麥田，2009）。
- 西成彥，《外地巡禮：越境的日語文學論》（臺北：允晨文化，2022）。
- 呂正惠，〈殉道者——呂赫若小說的「歷史哲學」及其歷史道路〉，《呂赫若小說全集（下）》（新北市：印刻，2006），頁660-692。
- 呂赫若，《清秋（日本植民地文學精選集39）》（東京：ゆまに書房，2001）。
- ，《呂赫若日記》（臺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
- 吳密察等，《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臺北：新自然主義：2009）。
- 河村昌子，〈時下日本における林語堂の邦〉，《千葉商大紀要》45卷3期（2007），頁51-64。
- 岡本隆司著，陳心慧譯，《中國為何反日？：中日對立五百年的深層結構》（新北：八旗，2017）。
- 邵軒磊，〈戰前東洋史學之觀念與知識系譜〉，《東亞觀念史集刊》3期（2012），頁335-360。
-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著，吳錦華、陳萃譯，〈文學身份／文化身份：在當代

- 世界中當一個中國人》，《臺灣學誌》9期(2014)，頁169-190。
- 高田真治，《支那思想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39)。
- 信夫清三郎著，周啓乾譯，《日本近代政治史(一)》(臺北：桂冠，1990)。
- 垂水千惠著，劉娟譯，《奮鬥的心靈：呂赫若與他的時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
- 施淑，〈最後的牛車——論呂赫若的小說〉，《兩岸文學論集》(臺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頁131-138。
- 若林正丈著，臺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臺北：播種者，2007)。
- 張文環，《張文環日本語作品及草稿全編》(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光碟資料)。
- 張文薰，〈「鄉土」的安魂曲：1940年代日語小說的空間分析〉，《「戰鼓聲中的歌者——龍瑛宗及其同時代東亞作家」論文集》(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11)，頁323-348。
- ，〈一九四〇年代臺灣日語小說之成立與臺北帝國大學〉，《臺灣文學學報》19期(2011)，頁99-132。
- 張誦聖，〈戰時臺灣文壇：「世界文學體系」的一個案例研究〉，《臺灣文學學報》31期(2017)，頁1-31。
-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の中國認識 アジアへの航跡》(東京：研文出版，1981)。
- 陳芳明，〈廢墟之花〉，《呂赫若小說全集(上)》(新北市：印刻，2006)，頁21-32。
- ，《臺灣新文學史(上)》(臺北：聯經，2011)。
- 陳映真等，《呂赫若作品研究》(臺北：聯合文學，1997)。
- 傅佛果(Joshua A. Fogel)著，陶德民、何英鶯譯，《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1866-1934)》(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
- 曾巧雲，〈故國之內·國境之外——日治前期《臺灣日日新報》上傳統文人的西渡經驗初探〉，《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8期(2014)，頁153-206。
- 華北交通株式会社資業局資料課編，《北支》5卷3期(1942)。
- 塚本照和，〈再錄呂赫若「陳夫人」の公演〉，《中國文化研究》16期(1999)，頁39-60。
- 楊逵，《楊逵全集 第五卷·小說卷(II)》(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9)。
- 葉石濤著，中島利郎、澤井律之日譯註解，彭萱漢譯，《臺灣文學史綱：日譯註解版》(高雄：春暉，2010)。
-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 澀澤社史資料庫，<https://shashi.shibusawa.or.jp/>(2022.10.25 徵引)。
- 齋藤希史著，盛浩偉譯，《「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新

- 北：群學，2020）。
- 羅詩雲，《臺灣日治時期知識分子的中國敘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2016）。
- 顧錚，〈戰爭的理由、視覺表徵與上海——木村伊兵衛與原弘的「上海」攝影特輯（1937-1938）〉，《社會科學》1期（2009），頁150-159。
- Nayoung Aimee KWON，〈Post/colonial Japanophone versus Global Japanophone〉，《跨境：日本語文学研究》8期（2019），頁8-14。